

引用格式:周睿,钟林生,虞虎.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管理措施的社区居民感知研究[J].资源科学,2017,39(1):40-49.
[Zhou R, Zhong L S, Yu H. Community perception towards Qi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System Pilot Area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J]. *Resources Science*, 2017, 39(1): 40-49]. DOI: 10.18402/resci.2017.01.05

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管理措施的社区居民感知研究

周睿^{1,2}, 钟林生^{1,3}, 虞虎^{1,3}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3.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摘要: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涉及3处保护地与4个乡镇,其国家公园相关管理政策与措施已开始实施,然而社区居民的感知状况尚不得知。基于实地调研获取的376份问卷数据,借助因子分析得到7项管理政策,其中,社区居民对共同管理政策感知最强,对功能分区政策感知最弱。由方差分析结果得知,7项管理政策的感知强度与4个乡镇具有关联关系,其中,4个乡镇分别对功能分区、发展定位、社区发展和共同管理政策最为敏感,可分别归因于原属地的功能分区、社区参与、产业发展和资源保护程度因素。未来,试点区管理部门应从不同地域社区居民的发展诉求出发,分别侧重居民福利保障、旅游特许经营、社区发展规划和共同参与管理政策,从而充分体现国家公园的公益性。

关键词:保护地;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管理措施;社区居民感知

DOI: 10.18402/resci.2017.01.05

1 引言

建立保护地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系统正常服务功能,为人类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健康生命支持系统的有效方法。国家公园是一种保护地类型,强调自然保护与社会服务^[1],以及充分满足当代与后代可持续利用需要的功能^[2]。然而,国家公园占用了原住民的生存空间而引发利益纷争^[3],倘若不能妥善处理国家公园与社区居民关系将会影响国家公园的保护效果^[4,5]。因此,国家公园制定管理措施时必须兼顾社区发展利益^[6-8]。

中国已启动了在部分保护地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工作。转型期的保护地正处于旧体制政策消退废止与新体制政策建立巩固相衔接的重要过渡阶段。在此期间,新体制实施对象的感知态度

是新体制能否顺利建立的关键性问题之一^[9]。本文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研究其自转型以来社区居民对新体制、新政策的感知状况。如此,既可以掌握试点区社区居民的诉求从而提供合理化政策建议,又可为中国探索国家公园体制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2 文献综述

借助居民感知来分析区域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10],也是了解和掌握转型过渡期受众居民态度的关键途径。国内已有保护地社区居民感知研究主要涉及不同时间、地域,以及特定政策背景下的感知对比。

(1)社区居民感知内容在保护地建立、发展的时间进程中不断丰富。通常,在保护地建立初期,

收稿日期:2016-09-10;修订日期:2016-12-0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71527);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与总体规划编制)。

作者简介:周睿,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博士,主要从事生态旅游、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 catherine-rui@hotmail.com

通讯作者:钟林生, E-mail: zhongls@igsnrr.ac.cn

2017年1月

因旅游是弥补社区居民被剥夺资源产权获益权的捷径^[11],故社区居民对旅游经济影响的感知最为强烈^[12]。社会交换理论可以有效解释这一现象^[13],并且,该现象也反映出保护地建立初期普遍偏重旅游功能的特征。随着保护地旅游不断发展成熟,社区居民逐渐对旅游社会和文化等影响形成认知^[14]。尤其是,旅游产生的负面影响唤醒了社区居民的保护意识,使居民认识到生态资源、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景观等都应被纳入到保护范畴^[14]。这些现象可进一步通过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阐释^[15],并折射出旅游发展、资源保护、社区居民感知三者之间变化互动的本质关系。

(2)社区居民感知内容在不同地域尺度的不同保护地背景下呈现出差异性,且产生分异的主导因素并不一致。无论国内外对比研究(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英国 New Forest 国家公园)^[16]还是国内对比研究(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西递世界遗产地)^[17]都发现,保护地所处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缘结构、主客文化差异等因素导致社区居民的主要感知内容与强度各不相同。此外,聚焦于更加微观的单一保护地背景,如黄山世界遗产地,距离因素往往是解释不同区位社区间感知差异的重要变量^[18]。在特定地域环境下,如某些欠发达地区,社区居民影响感知又会因居民群体特征不同而发生变化^[19]。

(3)社区居民感知受保护地实施的特定政策影响而产生改变。例如,武陵源世界遗产地执行的移民安置政策致使居民对经济、资源环境、社会文化等认知都发生了改变^[20]。

然而总体上看,时间尺度上的研究较少跨越保护地建立前后这段时间轴;空间尺度上的研究尚未聚焦单一保护地内因管理体制背景不同而诱发的社区居民感知差异;政策背景下的研究又较多关注旅游发展类政策,没有全面涉及与社区居民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政策。基于此,本文将时空轴线与综合政策相结合,研究在体制转型背景下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内不同空间社区居民对新管理措施的感知状况,以丰富前期保护地社区居民感知研究内容。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区概况

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以下简称试点区)设立于2015年,位于浙江省开化县境内,是由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古田山保护区)、钱江源国家级森林公园(以下简称钱江源森林公园)和钱江源省级风景名胜区(以下简称钱江源风景区)3处保护地转型而来。在管理体制上,现古田山保护区管理局、钱江源森林公园管理委员会、钱江源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整合成为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由浙江省政府垂直管理。在空间范围上,试点区覆盖苏庄、长虹、何田、齐溪4个乡镇部分区域的19个行政村72个自然村,面积252km²。其中,试点区苏庄镇与古田山保护区范围基本一致;试点区齐溪镇大部分与钱江源风景区范围重合;试点区长虹乡与何田乡则是连接3处保护地的生态保护过渡区域(图1)。在社区管理方面,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试点区管委会)制定了居民点调控、拆迁安置补偿、居民参与特许经营管理等措施。同时,其他管理措施,如资源管理、功能分区等也影响了社区居民生产生活。

3.2 数据来源与实地调研

调研组于2015年5-7月在试点区4个乡镇分别进行了问卷与访谈调研。调查问卷第一部分是性别、年龄、居住时间、家庭收入来源等几项常规人口统计学特征问题^[21];第二部分是试点区管委会已制定涉及社区发展的管理措施,包含32项变量,如表示社区参与资源生态保护的“X2社区居民应当共同承担保护资源的责任”措施^[22];与社区发展有关的“X14国家公园应当培训居民生活技能”措施^[23];涉及社区利益分配的“X25社区居民应获得农具等生产补贴”措施^[24];与社区生产生活相关的“X32国家公园应当划定居民生活区域”措施^[25]。此部分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法设计。

由于因子分析寻求变量间的内在结构,需要样本量与变量数的比例应至少在5:1以上,且原则上越多越好^[26],故根据试点区4个乡镇各自然村人口数量,等比例抽取了受访人数450人(表1,见43页)。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76份(苏庄镇150份、长虹乡80份、何田乡74份、齐溪镇72份),有效问卷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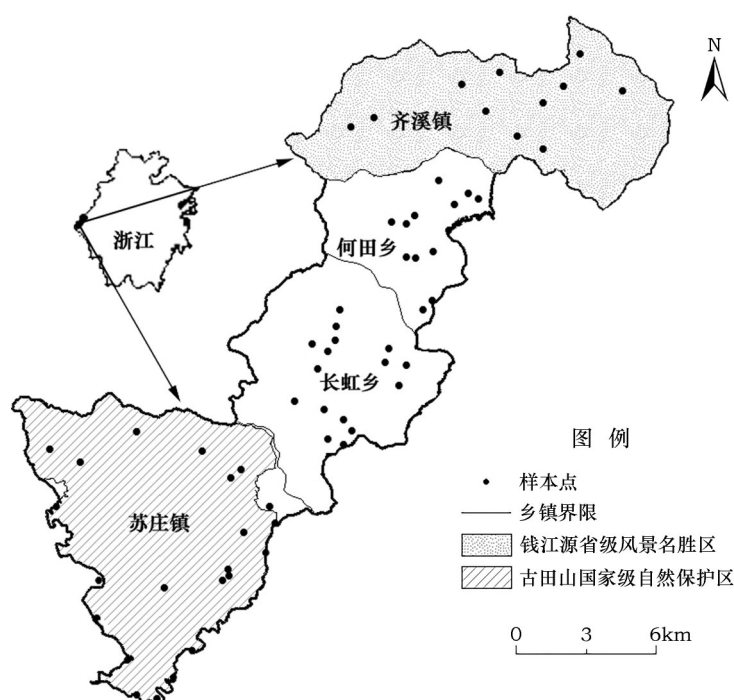


图1 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Figure 1 Location of Qi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System Pilot Area

收率为83.56%。使用SPSS19.0对获取的问卷数据进行处理。

3.3 分析方法

(1)因子分析。为将32项管理政策进行归类,掌握社区居民的总体感知规律,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降维。克隆巴哈系数(Cronbach's α)可用于信度检验。通常 $\alpha \geq 0.8$ 为内部一致性极好, $0.6 \leq \alpha < 0.8$ 为一致性较好, $\alpha < 0.6$ 则表示一致性较差^[27]。另外,KMO值和Bartlett球形检验用于检验各个变量是否各自独立。通常KMO值越接近1,说明检验效果越好^[28]。本问卷样本数据的Cronbach's $\alpha = 0.917$,KMO值=0.909, $p=0.000$ (表2),说明样本具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随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变量,并使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计算,结果显示32个变量旋转后的载荷均达到了0.5以上,且所有指标汇聚成7个特征根大于1的有效因子,前7个主成分因子累计解释率达到63.896%,超过社会科学的方差贡献率最低标准^[29](表3,见44页)。

再次,根据因子的共同指向并结合载荷最大的指标项为公因子命名。 F_1 指向社区参与试点区生

态环境保护措施,这与澳大利亚国家公园实施的通过向原住民传播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来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30]措施相一致,故将该因子命名为“共同管理政策”; F_2 指向试点区管理机构调整改革措施,这与澳大利亚北领地联邦政府专门设立了以土著居民代表占多数的管理机构^[31]措施有异曲同工之处,故将该因子命名为“机构调整政策”; F_3 指向社区民生福利和产业发展等管理措施,与英国国家公园制定的“社区可持续发展”政策^[32]十分近似,故将该因子命名为“社区发展政策”; F_4 指向试点区发展定位,贴近国外国家公园以法律法规形式规定国家公园的管理体制、政策等^[33]措施,因此将该因子命名为“发展定位政策”; F_5 与南非国家公园对失地原住民实施的移民安置与补偿^[34,35]措施相同,特将该因子命名为“利益补偿政策”; F_6 与将毛利文化与自然生态资源有机融合的新西兰国家公园^[36]管理措施相近,因而将该因子命名为“游憩利用政策”; F_7 指向试点区实施的分区管理措施,与英国国家公园允许社区居民在特别使用区内发展现代可持续农业^[32]措施类似,故将该因子命名为“功能分区政策”。

(2)方差分析。以公因子 F_1-F_7 作为依变量,4

2017年1月

表1 乡镇人口数与样本量

Table 1 Total population and data sample

乡镇	行政村	自然村	人口数	样本量	行政村	自然村	人口数	样本量
苏庄	横中	龙潭口	118	5	余村	外长坑头	80	4
		汪畈	215	10		内长坑头	6	0
		黄坞	27	1		冲凹	6	0
		罗家	178	8		青安塘	24	1
		横中	—	0		余村	—	0
	毛坦	下呈畈	—	0	苏庄	岭里头	2	0
		梣畈	—	0		东山	106	5
		梗上	—	0		苏庄	—	0
		毛坦	—	0		唐头	—	0
		新田畈	—	0		杨家	—	0
	古田	龙上	49	2	唐头	唐头	—	0
		宋坑	143	7		溪西	—	0
		洪源	236	11				
		平坑	—	0				
长虹	霞川	芳庄	296	14	真子坑	高田坑	296	14
		霞坞	242	11		马头坞	163	8
		坑口	313	14		老屋基	191	9
		大石龙	148	7		大阴坑	165	8
	库坑	西坑	389	4	桃源	大举	—	0
		隔坞	83	4		山蓬	—	0
		库坑	403	18		台回山	239	11
		昔树林	160	7		下山蛇	72	3
		横岭脚	42	2		长芦	—	0
	何田	西山	103	5	陆联			
		中秋	109	5		高源	—	0
		山茶尖	—	0		皂底	—	0
		四亩	—	0		里源头	203	10
		大智头	—	0		外源头	72	3
齐溪	田畈	中山	—	0	龙坑	横路上	93	4
		紫阳铺	—	0		大横	125	6
		大铺	56	3				
		上田岭	140	6		龙坑	684	51
		方家	246	11		益里	212	10
	里秧田	鲍坑	55	3	上村	高坑	183	8
		新田棚	55	3				
		后山湾	82	4		大鲍山	79	4
		里秧田	133	6		上村	502	36
		沿溪	122	6		枫岭头	89	4
	仁宗坑	仁宗坑	431	20	齐溪	西坑口	159	7
		中山村	203	9		齐溪田	209	10
	左溪							
		左溪	612	28				

注:人口数栏内为“—”的自然村表示居民点不在试点区范围,但有部分村集体所有土地在试点区范围。

表2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Table 2 KMO and Bartlett examinations

KMO 值	Bartlett's		
	近似卡方	Df	Sig.
0.909	6 168.091	496.000	0.000

个乡镇为自变量,采用ANOVA方法分析试点区4个乡镇社区居民是否对7项管理措施存在感知差异。首先计算各组均值与标准差进行方差的齐性检验,对于方差齐性检验未达到显著水平的($P>0.05$),采用Scheffe检验法进行事后检验;对于方差

表3 试点区受访居民感知的因子分析 (N=376)

Table 3 Factor analysis on respondent' perception in Pilot Area (N=376)					
公因子	测量指标	载荷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积/%
F1 共同管理政策	X1 报告环境情况	0.780	10.445	32.640	32.640
	X2 共同保护资源	0.773			
	X3 无害化垃圾处理	0.727			
	X4 处罚盗伐行为	0.699			
	X5 无害化死禽处理	0.658			
	X6 奖励保护行为	0.656			
	X7 适度利用自留山	0.530			
F2 机构调整政策	X8 明确居民地位	0.834	3.243	10.136	42.776
	X9 征求居民意见	0.827			
	X10 管理政策变化	0.778			
	X11 工作效率提高	0.753			
	X12 管理部门调整	0.674			
F3 社区发展政策	X13 提高教育水平	0.732	1.742	5.444	48.221
	X14 培训生活技能	0.725			
	X15 善用村规民约	0.667			
	X16 倡导节能设备	0.644			
	X17 制定产业计划	0.514			
	X18 提高环保意识	0.465			
	X19 发展特色产业	0.443			
F4 发展定位政策	X20 发展旅游业	0.750	1.588	4.962	53.183
	X21 科普知识	0.743			
	X22 环境教育	0.733			
	X23 生态展示	0.678			
F5 利益补偿政策	X24 NGOs资助	0.780	1.282	4.005	57.188
	X25 生产补贴	0.738			
	X26 移民补偿	0.704			
F6 游憩利用政策	X27 整合旅游资源	0.663	1.117	3.490	60.678
	X28 改善交通道路	0.634			
	X29 提升知名度	0.631			
F7 功能分区政策	X30 划定保护区域	0.631	1.030	3.218	63.896
	X31 划定旅游区域	0.580			
	X32 划定生活区域	0.538			

齐性检验达到显著水平的($P<0.05$),采用Tamhane's T2 检验法进行事后检验。同时,通过构建单变量的线性模型,利用关联强度系数与统计检验力判断自变量与依变量的关联程度与拒绝虚无假设的概率。

方差齐性检验表明检验变量 F1、F3、F4、F7 均达到0.05 显著水平,说明检验变量在组间存在显著差异,故使用Tamhane's T2 进行主体间效应项的检验。其中,关联强度系数 $\omega^2<0.059$ 表示变量间弱关

联; $0.059 \leq \omega^2<0.138$ 之间表示变量间中度关联; ≥ 0.138 则为强关联关系^[37]。

结果显示(表4),齐溪镇居民对 F1 变量的感知强于苏庄镇和何田乡,关联强度一般,统计检验力很高($1-\beta=0.937$);何田乡居民对 F3 变量的感知强于其他 3 个乡镇,关联强度一般,统计检验力很高($1-\beta=0.990$);长虹乡居民对 F4 变量的感知强于苏庄镇和何田乡,关联强度中等,统计检验力很高($1-\beta=0.994$);苏庄镇居民对 F7 变量的感知强于其他 3

2017年1月

表4 乡镇间受访居民的感知差异 (N=376)

Table 4 Perception differences from respondents among towns (N=376)

检验变量	方差齐性检验					主体间效应项的检验				
	Levene	Sig.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事后检验	ω^2	1- β
F1	4.560	0.004	15.783	3	5.261	5.448	0.001	d>a;d>c	0.34	0.937
F3	7.504	0.000	22.567	3	7.522	7.940	0.000	c>a;c>b;c>d	0.53	0.990
F4	5.807	0.001	23.541	3	7.362	8.268	0.000	b>a;b>c	0.62	0.994
F7	5.700	0.001	29.111	3	9.704	10.436	0.000	a>b;a>c;b>d	0.70	0.999

注:①使用 $\alpha=0.05$ 计算;②显著性水平0.05;③a苏庄镇,b长虹乡,c何田乡,d齐溪镇。

个乡镇,关联强度中等,统计检验力很高($1-\beta=0.999$)。另外,变量F2、F5、F8均未达到0.05显著水平,因此使用Scheffe检验法进行主体间效应项的检验。但因ANOVA检验都未达到显著水平($P>0.05$),检验变量在组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故表中不再列出相关检验结果。

4 结果分析

总体而言,试点区实施的7类新政策与国际国家公园的主流管理措施相符。其中,功能分区政策的方差贡献率最低,说明社区居民对此项政策感知最弱,推测这与仅在古田山保护区存在重大功能分区调整有关。相对而言,共同管理政策的方差贡献率最高,说明社区居民具备较高的环境保护意识与参与行为,并且认可开化县与古田山保护区等3处保护地一贯严格执行的保护政策。试点区内有钱塘江源头流域和低海拔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安全地位极高,被划为开化县禁止开发区,导致居民以种植稻谷、油菜、玉米、油茶等为主要生计方式,经济发展缓慢基础薄弱。近年来,开化县以“生态立县”为发展战略,取消了GDP考核,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和休闲养生业。如今,农家小馆、垂钓、油菜花观光等多元收入方式不仅拓展了居民的生计渠道,还使居民认识到自然生态资源的景观和体验价值,进而提升了居民的生态环保意识。

尽管如此,受调整前各自所属地域单元的发展定位、管理体制、政策措施等因素影响,4个乡镇社区居民对7类新政策的感知各有侧重。

(1)试点区苏庄镇。试点区苏庄镇社区居民对功能分区措施的感知强于其他乡镇,这与古田山保护区扩大保护区域和试点区调整功能分区有直接

关系。自1975年古田山保护区建立以来(时为省级保护区,2001年晋升为国家级保护区),面积不断扩张,保护强度逐渐升级,严重影响到区域内居民的生产生活。尽管,古田山保护区管理局采取了生态补偿、就业扶持等政策来缓和矛盾,但社区居民对管理措施仍颇有微词。试点区建立后对该区域的功能分区进行了重大调整。一方面,原古田山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图2a)统一调整为试点区核心保护区(图2b),导致更多自然村被置于需要严格保护的范围内,这意味着居民可能遭遇异地搬迁的命运。另一方面,原古田山保护区实验区(图2a)调整为试点区生态保育区(图2b),则该区域内原本鼓励进行的生态旅游和休闲养生项目将受到严格控制。例如,平坑村(原保护区的实验区)某农家乐经营者在尝到旅游发展的甜头后,萌生出修建一栋高档小楼的想法,用以接待追求高品质旅游体验的游客。然而,新出台的功能分区政策让经营者望而却步,更对未来旅游经营,乃至整个乡镇发展方向一筹莫展。于是,不难理解试点区苏庄镇社区居民对功能分区政策感知最为强烈的原因。

(2)试点区长虹乡。试点区长虹乡社区居民对发展定位政策的感知强于苏庄镇和何田乡,这与社区旅游参与程度高密不可分。长虹乡位于古田山保护区与何田乡之间的连接区域,发展限制程度相对不及保护区周边严格,因此长虹乡更有条件综合乡村文化展示、古村落游览、生态农业观光等要素来打造乡村旅游基地。并且,为保障乡村旅游开发效果,长虹乡政府还不断予以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和自主创业的机遇。另外,培训班课程不仅训练了居民参与旅游的技能还增强了社区居民从业就业创业的能力和信心。同时,访谈中也了解到,该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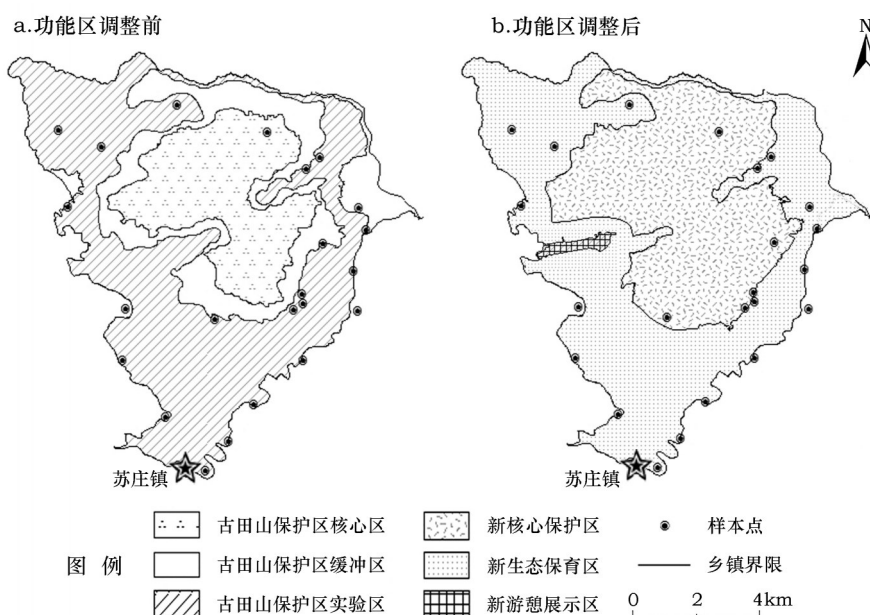


图2 试点区苏庄镇功能区调整示意图(原古田山保护区范围)

Figure 2 Orientation map of Suzhuang Town zoning adjustment in Pilot Area (original Gutianshan Nature Reserve Area)

社区居民对未来能否继续发展以及如何发展旅游业最为关心,这与定量分析结果相吻合。

(3)试点区何田乡。试点区何田乡社区居民对社区发展政策的感知强于其他乡镇,这与何田乡重视产业发展与民生问题有重要关系。试点区何田乡位于长虹乡与钱江源森林公园之间的连接区域,因此与长虹乡相似,何田乡的发展限制程度相对较弱。但差别在于,何田乡定位于打造生态农业休闲基地,并注重将农产品销售、农副产品加工、创意农业等串联以延伸生态农业产业链。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历经数百年的清水鱼养殖。钱江源头特有的水质赋予了清水鱼肉嫩味鲜,无泥腥味的独佳品质,不仅满足了外来旅游者品味美食的需求,还远销至杭州、上海等市场,供不应求。然而目前,以家庭庭院为基础的养殖形式规模较小、养殖品种单一,社区居民普遍期盼举乡镇政府之力打造大型养殖基地,并能享受政策、资金以及技术扶持。由此可知何田乡社区居民对社区发展政策感知最强的原因。

(4)试点区齐溪镇。试点区齐溪镇社区居民对共同管理政策的感知强于苏庄镇和何田乡,这与齐溪镇形成的社区参与式保护模式有关。试点区齐溪镇绝大多数社区位于钱江源森林公园和钱江源风景区管辖范围,“国家级森林公园”和“省级风景

名胜区”称号的双重光环效应惠及社区居民优先参与旅游的机遇。尤其是在左溪-上村-后山湾-里秧田旅游主干线上的社区居民获得了相对可观的旅游收入,并认同资源才是其生存命脉的理念,因而环保意识普遍较高。并且,随试点区定位该区域为生态保育与游憩利用并举,更加激发了居民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因此可理解该区域社区居民对共同管理政策感知最为强烈的原因。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研究了自转型以来其社区居民对其新政策的感知状况。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由因子分析法提取的7项公因子与国际国家公园主流管理政策相符。其中,社区居民对共同管理政策感知强度最高,应与该区域功能定位及严格保护政策有密切关系;社区居民对功能分区政策感知最弱,推测与仅在古田山区域有重大功能分区调整有关。

(2)方差分析法与单变量线性模型结果表明,试点区苏庄镇、长虹乡、何田乡和齐溪镇社区居民分别对功能分区、发展定位、社区发展以及共同管理政策的感知强于其他2个或3个乡镇。据分析,感知差异原因与原属地的功能分区、社区参与、产

2017年1月

业发展和资源保护程度因素密切相关。

5.2 政策建议

对于试点区苏庄镇居民,当前试点区拟采取异地搬迁办法以确保核心保护区达到“零干扰”保护效果,然而事实上,外迁居民的生计问题还需要各项福利措施从根本上加以保障,因此开化县政府与试点区管委会应加强对搬迁居民的技能培训与就业扶持,并吸纳居民融入安置地的主导产业。对于试点区长虹乡居民,政府应利用好已有的社区旅游发展基础,调动居民积极性打造精品社区和特色旅游项目。特别是,试点区应给予有能力有意愿拓展旅游的居民以特许经营权利,从制度上确保社区从旅游参与中获益。对于试点区何田乡居民,政府应开辟多元化产业渠道,给予更多财政补贴和技术支持,从根本上提升居民个人素质。对于齐溪镇居民,政府应更加注重协调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以此兼顾试点区生态保护、旅游利用与社区发展的多重需求。

总之,社区居民是保护地重要利益主体之一,对生态保护和区域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原有基础,试点区管委会应从不同地域社区居民的发展诉求出发,分别侧重居民福利保障、旅游特许经营、社区发展规划和共同参与管理政策,从而体现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国家公园的公益性本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孟宪民. 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管理经验: 兼谈对中国风景名胜区的启示[J]. 世界林业研究, 2007, 20(1): 75-79. [Meng X M. Management experience of American national park system: And connotation to scenic areas in China[J]. *World Forestry Research*, 2007, 20(1): 75-79.]
- [2] 罗金华. 中国国家公园设置及其标准研究[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Luo J H. Setting and Criteria Study on Chinese National Park[D]. Fuzhou: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2013.]
- [3] 张海燕. 紫鹊界梯田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表现及分析[J]. 消费导刊, 2009, (8): 32-34. [Zhang H Y. Key stakeholders of Ziquejie terrace scenic area: Benefit problems and analysis[J]. *Consume Guide*, 2009, (8): 32-34.]
- [4] Daim M S, Bakri A F, Kamarudin H, et al. Being neighbor to a national park: Are we ready for community participation?[J]. *Asia*

Pacifi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Behaviour Studies, Salamis Bay Conti Resort Hotel, Famagusta, North Cyprus, 2012, 36: 211-220.

- [5] Anthony B P, Swemmer L. Co- defining program success: Identifying objectives and indicators for a livestock damage compensation scheme at Kruger National Park, South Africa[J]. *Journal for Nature Conservation*, 2015, 26: 65-77.
- [6] Thouless C. New tourism concessions in national parks to benefit community conservancies in Namibia[J]. *Oryx*, 2014, 48 (3): 327-328.
- [7] Strickland- Munro J K, Moore S A, Freitag- Ronaldson S. The impacts of tourism on two communities adjacent to the Kruger National Park, South Africa[J]. *Development Southern Africa*, 2010, 27(5): 663-678.
- [8] 王丽丽. 国外国家公园社区问题研究综述[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09, 21(1): 73-77. [Wang L L. An overview of the topic on local community in national park in foreign countries[J]. *Yunnan Geographic Environment Research*, 2009, 21(1): 73-77.]
- [9] 刘少和. 旅游转型研究综述及我国旅游转型发展的探讨[J]. 旅游论坛, 2008, 6(3): 322-325. [Liu S H. Study on peasant's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in tourism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ed areas[J]. *Tourism Forum*, 2008, 6(3): 322-325.]
- [10] 徐广才, 康慕谊, 贺丽娜, 等. 生态脆弱性及其研究进展[J]. 生态学报, 2009, 29(5): 2578-2588. [Xu G C, Kang M Y, He L N, et al. Advances in research on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09, 29(5): 2578-2588.]
- [11] 卢松, 张捷, 苏勤.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的历时性分析-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景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09, 28(2): 536-547. [Lu S, Zhang J, Su Q. The temporally comparative study of resident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in ancient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Xidi Village, one of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9, 28(2): 536-547.]
- [12] 史春云, 张捷, 李东和. 基于个体视角下的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研究-以九寨沟为例[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7, (11): 11-17. [Shi C Y, Zhang J, Li D H. Study of the resident perception and attitudes in destination from individual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n Jiuzhaigou[J].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07, (11): 11-17.]
- [13] 胥兴安, 王立磊, 张广宇. 感知公平、社区支持感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关系-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J]. 旅游科学, 2015, 29(5): 14-26. [Xu X A, Wang L L, Zhang G Y. Relationships among perceived justice, perceived community support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xchange theory[J]. *Tourism Science*, 2015, 29(5): 14-26.]
- [14] Reimann M, Lamp M L, Palang H. Tourism impacts and local communities in Estonian national parks[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2011, 58(11): 87-99.

- [15] 黄玉理, 龙良富, 王玉琼. 我国世界遗产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的比较研究—以平遥、丽江古城为例[J]. 人文地理, 2008, (2): 91–94. [Huang Y L, Long L F, Wang Y Q. A comparative study on residents' perception and attitudes on tourism impacts of world heritage destinations: A case study of Pingyao and Lijiang Ancient Cities[J]. *Human Geography*, 2008, (2): 91–94.]
- [16] 程绍文, 张捷, 徐菲菲, 等. 自然旅游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期望与旅游影响感知对其旅游态度的影响—对中国九寨沟和英国 NF 国家公园的比较研究[J]. 地理研究, 2010, 29(12): 2179–2188. [Cheng S W, Zhang J, Xu F F, et al. Effect of residents' tourism development expectation and tourism impacts perception on their attitude towards tourism in natural tourist destin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hina's Jiuzhaigou and the UK's New Forest National Parks[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0, 29(12): 2179–2188.]
- [17] 卢松, 张捷, 李东和, 等.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比较—以西递景区与九寨沟景区为例[J]. 地理学报, 2008, 63(6): 646–656. [Lu S, Zhang J, Li D H, et al. Comparison of resort resident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Case studies in Xidi village and Jiuzhaigou[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63(6): 646–656.]
- [18] 尹寿兵, 刘云霞. 景区毗邻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的差异及机制研究—以黄山市汤口镇为例[J]. 地理科学, 2013, 33(4): 427–434. [Yin S B, Liu Y X. Difference and mechanism of resident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adjacent to scenic spot: A case study of Tangkou Town, Huangshan City[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33(4): 427–434.]
- [19] 崔晓明, Chris Ryan. 欠发达地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的实证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0, 31(8): 187–191. [Cui X M, Chris R. Case studies on residents' perception and attitude towards tourism in undeveloped area[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010, 31(8): 187–191.]
- [20] 王凯, 欧艳, 葛全胜. 世界遗产地居民对生态移民影响的感知—以武陵源3个移民安置区为例[J]. 应用生态学报, 2012, 23(6): 1663–1670. [Wang K, Ou Y, Ge Q S. Perception of residents in world heritage site to the effects of ecological migration: A case study of three migrant resettlement spots in Wulingyuan Hunan Province of South-central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12, 23(6): 1663–1670.]
- [21] 赵玉宗, 李东和, 黄明丽. 国外旅游地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研究综述[J]. 旅游学刊, 2005, 20(4): 85–92. [Zhao Y Z, Li D H, Huang M L. On the Resident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ourist destinations overseas: A review[J]. *Tourism Tribune*, 2005, 20(4): 85–92.]
- [22] Bennett N J, Dearden P. Why local people do not support conservation: Community perceptions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 livelihood impacts,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in Thailand[J]. *Marine Policy*, 2014, 44(1): 107–116.
- [23] Mastura J, Kalsom K, Tania-Maria T, et al. Nature-based rural tourism and its economic benefits: A case study of Kinabalu National Park[J]. *Worldwide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Themes*, 2013, 5(4): 342–352.
- [24] 张进伟. 云南省国家公园与社区旅游利益分配制度必要性研究[J]. 经济研究导刊, 2012, (34): 163–164. [Zhang J W. The necessity study on Yunnan Province national park and community benefit distribution[J]. *Economic Research Guide*, 2012, (34): 163–164.]
- [25] 陈耀华, 黄丹, 颜思琦. 论国家公园的公益性: 国家主导性和科学性[J]. 地理科学, 2014, 34(3): 257–264. [Chen Y H, Huang D, Yan S Q. Discussions on public welfare, state dominance and scientificity of national park[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3): 257–264.]
- [26] 张文彤, 邱春伟. SPSS 统计分析基础教程(第2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Zhang W T, Kuang C W. SPSS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Basic Tutorial (2ed Edition) [M]. Beijing: High Education Press, 2011.]
- [27] 刘宇, 汪邦军, 金春华. 项目评估中信用与效度测定模型的构建与应用[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9, (11): 128–140. [Liu Y, Wang B J, Jin C H. Method and empirical study on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for bid evaluation in engineering projects[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2009, (11): 128–140.]
- [28] 片峰, 栾维新, 孙战秀, 等. 基于铁路距离的环渤海铁矿石中转港腹地划分[J]. 经济地理, 2015, 35(4): 99–107. [Pian F, Luan W X, Sun Z X, et al. A rail distance based measurement for urban hinterland area of the iron ore transshipment port in the Bohai rim reg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4): 99–107.]
- [29] Hair J F, Black W C, Babin B J, et al.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A Global Perspective (7th edition) [M]. New Jersey (USA): Prentice Hall, 2010.
- [30] 杨朝飞. 澳大利亚、新西兰有关遗传资源管理的启示[J]. 世界环境, 2001, (1): 38–41. [Yang C F. Reflection on genetic resources management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J]. *World Environment*, 2001, (1): 38–41.]
- [31] 贾丽奇, 杨锐. 澳大利亚世界自然遗产管理框架研究[J]. 中国园林, 2013, (9): 20–24. [Jia L Q, Yang R. Research on the management framework of world natural heritage in Australia[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3, (9): 20–24.]
- [32] 王应临, 杨锐, 埃卡特·兰格. 英国国家公园管理体系评述[J]. 中国园林, 2013, (9): 11–19. [Wang Y L, Yang R, Eckart L. Review on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national parks in Great Britain[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3, (9): 11–19.]
- [33] 束晨阳. 对风景名胜区规划中有关分区问题的讨论[J]. 中国园林, 2007, 23(4): 13–17. [Shu C Y. Discussion of the zoning

2017年1月

- issues in famous scenic sites planning[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07, 23(4): 13-17.]
- [34] Niekerk M V. Advocat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integrated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local destinations: The case of South Africa[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4, 3(2): 1-3.
- [35] Reid H. Contractual national parks and the Makuleke community [J]. *Human Ecology*, 2001, 29(2): 135-155.
- [36] 刘鸿雁. 加拿大国家公园的建设与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生态学杂志, 2001, 20(6): 50-55. [Liu H Y.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Canada's national parks and its implication in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 Ecology*, 2001, 20(6): 50-55.]
- [37] Cohen J.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nd edition)[M]. Hillsdale: Lawrence Earlbaum Associates, 1988.

Community perception towards Qi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System Pilot Area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ZHOU Rui^{1,2}, ZHONG Linsheng^{1,3}, YU Hu^{1,3}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System,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Certain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 are transitioning to National Park System Pilot Areas, in which local community perception is a key issue. Based on three types of protected areas and four towns, Qi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System Pilot Area is one such transitional area. However, the local communities have little knowledge about new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and communit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including original protected areas and townships) have a long and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with park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It is inferred that community clusters at different regional scales may have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the park and its transition. Based on data from 376 questionnaires, we use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to acquire seven basic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consistent with current international national park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The perception towards co-management and zoning are respectively the strongest and weakest. The result of ANOVA test showed that the seven basic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are relevant to four towns' administrative policies. For instance, communities from Suzhuang Town are the most sensitive to zoning policy, which could be attributed to strict protection of nearby Gutian Mountain Nature Reserve. In contrast, communities from Changhong Town perceives the strongest functioning policy,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ir high involvement in tourism. For future policy making,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the Pilot Area should consider communities' appeal based on different regions and development conditions. For example, Suzhuang and Changhong Town should respectively pay attention to resident welfare and tourism concession policy to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national park and local community.

Key words: protected area; Qi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System Pilot Area;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community perception